

從新聞組織看日常新聞查證： 以臺灣四大報為例^{*}

江靜之^{**}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深度訪談四大報共 30 位記者與主管，從組織角度探析日常新聞查證慣例與實踐。本研究發現查證慣例主要起於新聞個案，浮現於組織互動。除非是重要新聞，否則報社多將查證視為記者工作與責任。報社對新聞查證的要求顯現於守門關卡多寡、核稿者是否有路線相關知識，及核稿者與記者的互動。由此來看也可見報社對紙本的查證要求高於即時新聞，尤其後者「搶快」、「爭先」透過組織激化，加上其能接受少量訊息且可不斷更新，提高容忍新聞錯誤「瑕疵」的程度。最後，本研究強調報社能發揮團體優勢，進行查證。尤其跨線查證能獲得不同路線消息來源的回應、交叉確認、分頭查證持續式新聞，甚至發現更多證據，改變原有新聞設計，提高新聞品質。

關鍵字：日常新聞、協力查證、新聞查證、新聞組織、慣例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4-125-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接受本研究訪談之所有新聞工作者，以及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

^{**} E-mail: morecc@nccu.edu.tw

投稿日期：2020 年 11 月 20 日；接受日期：2021 年 05 月 28 日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N SHU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
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ao-Wu Memorial
for Chinese Journalism

壹、前言

「查證」(verification) 是新聞的基礎 (Kovach & Rosenstiel, 2001, p. 71)，也是記者向閱聽人證明新聞可信度的關鍵之法 (Winterlin & Blöbaum, 2016)。而且，正是「查證」讓新聞業成為一種專業 (Hermida, 2015, p. 60)，確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性。特別在資訊氾濫的網路時代，Fenton & Witschge (2011) 研究指出，專業記者認為查證消息來源、確認正確性與建構真實，傳遞可信且符合公眾利益的事實資訊給社會大眾，是自己不同於業餘記者之處。

「查證」不但是新聞專業、權威及獲取公眾信任之關鍵，更是未來新聞組織必須努力達成，不可或缺的核心價值 (Bruno, 2011; Kovach & Rosenstiel, 2010; Phillips, 2010)。特別是在公民記者崛起的數位時代中，由於公民記者不像專業記者有確認消息來源及事實的義務 (Rubin et al., 2015, January)，新聞查證之實踐及品質便是新聞組織凸顯自己價值所在的決勝關鍵。如同 Kovach & Rosenstiel (2010) 強調，「如何處理證據」是閱聽人未來辨識新聞組織可信度最有用的方式之一（同上引，p. 121），而未來新聞機構的權威主要來自新聞正確性、查證及對資訊的冷靜評估（同上引，p. 176）。

而且，新聞查證可謂是個團隊活動 (Silverman & Tsubaki, 2014, p. 11)。Lasorsa & Dai (2007) 指出：「新聞室的編輯系統便是被設計用來抓出意料之外的錯誤」。從積極面來看，報社記者的查證工作是在新聞組織及機構支持下進行 (江靜之，2016 年 6 月)；新聞台的組織常規會影響記者的查證實踐 (劉蕙苓，2014，頁 73)，產製規則也會影響電視新聞使用網友消息來源的比例及來源 (劉慧雯，2013)。再以 Schmitz Weiss (2008) 研究為例，他透過民俗誌法研究美國與墨西哥的兩家新聞媒體，分析其網路新聞產製，發現兩家媒體的網路新聞小組之通力合作直接影響記者的查證活動。

近年雖因網路及社群媒體崛起，不少國內外研究開始關注新聞查證，但可惜的是，其多從記者或編輯個人角度出發，探析新聞工作者如何運用網路資源查證 (李嘉紘，2013；趙敏雅，2019；蕭伊貽、陳百齡，2013 年 7 月；Brandtzaeg et al., 2016；Bruno, 2011；Hermida, 2015；Machill & Beiler, 2009；Rauchfleisch et al., 2017；Ruth, 2016；Thurman, 2015；Tylor, 2015)。相較之下，從組織角度探究新聞查證實踐工作的研究論文屈指可數 (Bruno, 2011；Schmitz Weiss, 2008)，國內專文研究更是付之闕如，未曾探討新聞組織如何形成及落實查證規範，以及新聞組織能如何發揮團隊合作之效，提升核心價值。

尤其近年即時新聞崛起，國內研究多認為追求快速的即時新聞對報社記者查證產生負面影響（王毓莉，2016；彭慧明，2016；蘇木春，2017；劉蕙苓，2018）。然而，國內四大報目前處於同時產製紙本與網路新聞（即時新聞只是網路新聞的一種類型）的新舊媒體產製交會點，¹ 即時新聞對新聞查證的影響較過去研究所述之情況更加複雜。而今臺灣報社處於紙本與網路新聞共存的轉型期，正提供我們從組織層面一探包含即時新聞在內的日常新聞查證之契機。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新聞組織角度切入，透過深度訪談 30 位臺灣四大報編輯主管及記者，探析以下四個問題：第一，報社如何形成日常新聞的查證規範及其實踐情況；第二，當即時新聞成為日常新聞的重要部分，報社對即時與紙本新聞的查證標準有何差異，以及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第三，在前述新聞機構及組織影響下，記者的一般日常及即時新聞的查證實踐活動特徵；第四，報社可以如何發揮組織優勢，協力查證，提升報導品質。

貳、文獻檢閱

根據 Schmitz Weiss (2008)，「查證」乃指記者於新聞刊登前，釐清與確認自己獲得之資訊。此外，新聞查證也可如 Kovach & Rosenstiel (2010, p. 98) 所言，涉及新聞呈現之證據，以及其如何被測試或證實，可謂是新聞工作者達成客觀性 (objectivity) 的關鍵。Kovach & Rosenstiel (同上引, pp. 172-173) 便主張，「客觀性」是運用一個客觀與透明的方法蒐集及查證新聞，近似科學所謂的客觀。

不過，客觀也如 Tuchman (1972) 所言，是新聞組織與從業人員用來免於訴訟及維護名聲的策略儀式，故新聞查證也可被視為一種策略儀式，用以正當化記者角色 (Shapiro et al., 2013)。尤其今日即使我們已認知到新聞的建構本質，了解新聞難以達到完全客觀，如同 Manning (2001) 強調，新聞工作者依然負有盡可能無私地 (disinterested) 評估所有可得證據的責任。此責任具體落在查證行動上，成為 Broersma (2010) 所說的，說服閱聽人新聞敘述為真的表演論述 (a performative discourse) 的一部分。因此，查證被視為新聞工作者盡責的表現，但凡查證可以快又便捷，記者便傾向採取查證行動 (Diekerhof & Bakker, 2012)。甚至明知消息來源不會回應，記者也會

1 《蘋果日報》已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停止紙本發行。

採取訪問行動，顯示自己已盡查證之責（江靜之，2016 年 6 月）。

換言之，查證既是新聞組織及工作者追求客觀的方法，也是正當化自己角色，建立與維護自身名聲，同時避免攻擊之良方。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新聞類型眾多，本研究認為「新聞查證」既可指日常新聞的事實釐清與確認，強調正確性，也包含調查報導對證據輕重的衡量與評估，追求真實性（*veracity*）（Ettema & Glasser, 1985）。但因「正確」、「客觀」被視為日常新聞的基本，故過去關注記者如何進行新聞查證之研究，如 Diekerhof & Bakker（2012）與 Shapiro et al.（2013），也多將討論置於記者如何確認消息來源及事實內容。

可惜的是，如本研究之前所述，過去研究較少從組織層面探析新聞查證實踐。但 Anderson et al.（2015）提醒，當我們探問記者未來可能及應該做甚麼的時候，絕不可忽略機構的重要性，因為是組織及新聞室創造工作流模式（*workflow patterns*）支持記者從事專業工作。而從守門人理論來看，Shoemaker & Vos（2009, p. 40）也指出，記者的決策規則（*decision rules*）是由組織建立，所以從慣例（*routines*）及組織層次進行分析較為適當，新聞查證自然也不例外。

一、查證慣例

Shoemaker & Reese（1996, p. 105）指出，「慣例」為媒體工作者用來執行工作，即指那些有模式、常規化且重複的實踐與形式。這些慣例形成新聞工作者執行工作的當下環境（*immediate environment*），影響內容產製甚鉅。進而，他們建議可從閱聽人、組織及消息來源三個面向，思考新聞慣例。例如倒金字塔的新聞稿寫法，讓讀者（閱聽人）只需看前面段落便可知最重要的訊息；編輯（組織）可視版面多寡，從記者傳回的新聞稿最後開始刪減，無須重寫（同上引，p. 109）。

在日常新聞產製中，新聞組織為了每日產出「新」聞，便依現代社會機構，將記者部署於能穩定提供有時效性資訊的新聞點，事先掌握新聞事件，成為固定的採訪路線（Roshco, 1975／姜雪影譯，1994，頁 102）。如同 Ericson（1998, p. 85）所說，權威與知識的「機構化形式」賦予消息來源可信度，機構組織決定了誰是有權威的知者。而記者便是在消息來源作為事件的標準見證者（*normative witness to events*）的表面基礎上，建立新聞的事

實價值 (fact value)。因此，日常新聞的查證慣例多隱含於路線（如政治新聞）記者負責的官僚或組織體系（如總統府、立法院等）中，記者主要依賴由官方消息來源掌控的常規管道 (Shoemaker & Vos, 2009, p. 54)，以便在截稿時間前，又快又有效率地取得權威訊息。這也使得「訪問權威消息來源」如 Tuchman (1978) 所言，成為新聞查證慣例之一。

或許正因如此，在日常新聞報導中，並未有一套形諸文字的查證慣例規定 (Shapiro et al., 2013, p. 658)。事實上，新聞組織本難硬性規定記者須查證所有日常新聞。一來從新聞組織特性來看，Tunstall (1971) 指出新聞組織處理的工作有許多例外個案，處理的問題也常是模糊、無法分析的，其看重經驗與直覺，且組織結構也不像官僚體系那樣階層及權威分明。二來就查證實踐來看，Wintterlin & Blöbaum (2016) 透過文獻檢閱強調，記者不可能在報導前確認所有資訊，且記者是在查證所有資訊與其對消息來源的信任之間求取平衡，亦即記者經常是考量資訊敏感度、有無其他消息來源及原來消息來源可信度後，再決定是否要確認消息來源。

一旦日常新聞查證慣例消融至記者的路線經營，成為所有新聞工作者皆須遵守，卻模糊不清的抽象慣例時，個別記者的新聞查證實踐便充滿變異。因為只有當規則明顯且詳盡，Shoemaker & Vos (2009, p. 40) 指出，個別行動者應用規則的變異性才會相對縮小。故此，新聞查證實踐充滿例外。Shapiro et al. (2013) 訪問加拿大記者發現，除非新聞資訊過於敏感，否則記者在以下情況中，似乎可以接受新聞僅有單一消息來源：與消息來源個人歷史有關的事實、無法被立即確認的資訊、非新聞故事的必要資料。江靜之 (2016 年 6 月) 訪談國內報社記者發現，在新聞機構慣例與文類、截稿時間與新聞競爭、媒體特質等情境限制下，記者查證經常「不求全」（同上引，頁 4）。劉蕙苓 (2014，頁 72-73) 分析國內電視新聞產製也發現，新聞室處理網路影音素材常在查證困難、耗時、爭取收視及查證責任之間掙扎，出現一種「形式重於責任」的查證方式。

此外，就新聞工作者依新聞事件主題或內容所做的新聞分類言之，Tuchman (1973) 研究指出，其同樣與新聞慣例息息相關。例如軟、硬新聞的區別反映了新聞處理及刊出的時程安排 (scheduling) 問題（例如大部分硬新聞屬於可預先安排，或意料之外無法預先安排的事件，而可隨意安排刊出時間的事件常是調查報導或軟新聞）；突發新聞 (spot news) 及發展中新聞 (developing news，即事實資訊隨事件發展逐漸浮現) 用來處理無法預先

安排的事件，與資源配置和科技應用的變化有關；持續式新聞（continuing news）植基於預測新聞事件發展軌跡的問題之上，強化對工作的控制，以處理可預先安排的事件。

無論如何，「查證」絕對是新聞守門的重要議題。可惜回顧新聞守門人研究，其多聚焦於影響新聞選擇或新聞性之「慣例」，鮮少直接討論新聞查證。不過，根據 Shoemaker & Vos（2009, pp. 56-58）檢閱的守門人文獻，本研究認為下列因素可能影響新聞查證慣例，值得參考：

- （一）管理決策：新聞組織的管理決策直接影響員工行動與產製內容。例如新聞組織決定採用某項新科技（如電子郵件），可能建立某種慣例影響新聞室運作、資料蒐集或與閱聽人的關係。
- （二）新聞的重要性：過去研究指出慣例在決定重要（prominent）新聞時有較大影響力。相對之下，守門人個人偏好或媒介差異造成的影響則發揮在重要性較低的新聞上。
- （三）新聞版面的需求：組織需要將新聞版面或時段填滿，使得「生產更多新聞」有時反而成為守門人的主要目標。
- （四）截稿時間的壓力：過去研究指出，當截稿時間迫在眉睫，守門人便會受限於手上現有訊息，但若有更多時間，則可能跟進新聞線索，尋找一般不會進入組織的資訊。Reich & Godler（2014）也證實，記者掌握的時間越少，其依賴消息來源的數量及機密資訊（leaked information）便越少。且記者會為了省時，近用如公關等消息來源。
- （五）其他守門人如新聞同業的影響：Shoemaker & Reese（1996, pp. 123-124）指出新聞組織監看及參考其他媒體，以及自己過去報導，可讓組織確認報導正確性，降低風險。Donsbach（2004）也指出記者進行新聞決策時，常處於不確定或懸而未決的情境中，所以偏向依賴其他記者同業來做決定，因為記者同業不但易於近用，更是專業規範的體現。

以劉蕙苓（2018，頁 46）稱為「新聞室新慣例」的即時新聞看上述各點與查證的關係可以發現，首先，劉蕙苓指出臺灣媒體於 2013 至 2014 年間，開始大量產製即時新聞，有報社將之當成評量記者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在採用即時新聞的相關「管理決策」下，劉蕙苓指出，即時新聞「即採即發時時截稿」的特性重新分配與結構化新聞產製時間，讓記者須在「數量」與「新聞價值」（包含新聞重要性）間權衡輕重（同上

引，頁 55)。本研究認為，即時新聞「數量」之所以是個問題，乃因記者面對的是網路空間，這似乎永遠填不滿的「新聞版面需求」；即時新聞「無截稿時間」的競速壓力則讓記者處理新聞資訊的方式偏向「受限於自己手上現有訊息」。加上網路資訊氾濫且非所有記者皆具備善用網路的能力，Phillips (2010) 指出許多記者反而更依賴能快速近用，且能提供準確訊息的傳統消息來源。Lecheler & Kruikemeier (2015) 分析線上新聞消息來源相關研究也發現，大部分研究認為線上消息來源並未取代原有消息來源，且新聞報導仍然依賴傳統消息來源，偏好菁英。

不過，當面臨海外災難新聞，傳統國內消息來源無法即時提供有效訊息時，新聞工作者只好轉向線上消息來源，如社群媒體使用者，但也面臨搶快刊登，或待查證完畢再發布的兩難。例如 Bruno (2011) 分析 CNN、《衛報》及 BBC 的 2012 年海地大地震報導發現，前二者採先刊登再查證的作法，BBC 則堅持對線上消息來源進行事實確認與查證，同時確認能夠使用網友提供的素材後才刊登新聞。舉例來說，Bruno 指出，BBC 於 2005 年成立的網路素材中心 (UGC Hub) 若在推特上發現一個消息來源，首要之務便是聯絡此人，透過詢問現場相關訊息，抑或透過確認該消息來源在推特上擁有的追蹤人數、過去發言類型等，確認消息來源真實性。

Bruno (2011) 認為 CNN 與《衛報》的作法雖有助於消息來源的多樣性與豐富新聞內容，卻可能危及「新聞須查證」這一金科玉律；而 BBC 堅守先查證後刊登的作法卻讓其使用的網友素材數量小於前二者。值得注意的是，Bruno 的研究也發現，新聞組織主要使用社群媒體內容填補因記者無法進入事件發生地，或通訊設備崩壞等產生的新聞真空 (news-vacuum)。一旦新聞真空狀態消失，新聞組織便會降低對社群媒體的依賴，重拾傳統報導模式。

最後，根據 Shoemaker & Reese (1996, p. 124)，過去文獻也指出科技讓新聞工作者更易獲取其他媒體的新聞，強化新聞媒體的相互依賴。尤其對網路新聞來說，Boczkowski (2010, pp. 41-42) 指出「速度」一方面因「立即性」(immediacy) 成為決定新聞性的重要因素，而變成編輯標準，另方面也因記者要透過確認他人的新聞是否先於自己刊登，而成為評估記者表現的度量準則。在這（新聞量）規模持續擴大的新聞競速環境中，甚至出現如 Phillips (2010, p. 99) 所說，記者將耗費時間與心力的查證活動「最小化」，並拆用 (cannibalize) 與換個角度 (re-angle) 呈現網路上公開可得的各種資訊。

二、組織分工與查證規定

Shoemaker & Vos (2009, p. 60) 指出，「慣例」起於並且符合組織的需要。他們認為若不同媒體組織會形成不同慣例，抑或同類型媒體也會發展出不同慣例，便應納入「組織」層次的分析（同上引，p. 59）。尤其新聞組織擁有雇用與解雇新聞工作者的權力，Shoemaker & Vos 強調組織的目標、管理風格、新聞政策、新聞室文化及員工安排等，都會影響新聞守門。

如前所述，「查證」是新聞組織自我保護及維護名聲的策略儀式，且具體落實於組織分工及新聞室編輯系統中 (Lasorsa & Dai, 2007)。以國內報社的新聞處理流程來看，根據陳萬達 (2008，頁 210-211)，報紙新聞需經數道關卡，包括（採訪中心）記者、採訪小組召集人、採訪主任、（編輯中心）編輯主任、版面編輯及新聞校對。其中，編輯選擇新聞的首要考量便是新聞須正確可靠（同上引，頁 218），而且除了考量新聞價值與讀者利益外，編輯還要捨棄或查證「真實性有待查證的稿件」，並「修正錯別字、標點符號……如有疑問，立即找記者查證」（同上引，頁 192）。此外，新聞組織也可設立事實查核員（fact-checker）或相關部門檢視新聞故事，確認如日期等事實細節 (Coronel et al., 2015)。

Coronel et al. (2015) 研究滾石雜誌 (Rolling Stone) 對維吉尼亞大學學生會強暴案的錯誤報導，發現除了因記者過度依賴單一消息來源，新聞組織也有責任，因為編輯與事實查核員未強力要求記者向其他關鍵消息來源查證，也沒有另行確認，還允許記者將消息來源做匿名處理。此外，Lasorsa & Dai (2007) 分析十件美國主要新聞組織的著名造假新聞，發現記者造假大多有跡可循，但新聞組織卻因下述原因，未能提早發現與預防：組織內部各單位未能彼此分享警訊、編輯過於信任記者、記者濫用新聞室的資料資源、對發稿日期地點與雇用兼職記者缺乏明確標準、對確認事實的標準降低等，Lasorsa & Dai 也強調信任與懷疑應並存於新聞室中。

尤其當新聞室面對海量的網路資訊，Kovach & Rosenstiel (2010) 強調，編輯的查證工作量變得更大、更重要。Schmitz Weiss (2008) 建議新聞組織可透過設置小組與產製流程提高網路新聞的效率及品質，例如刊出新聞前經過數個編輯的查證點。Schmitz Weiss 的研究也指出，小組成員可以分頭查證確認，再彼此分享，同時確認內容正確性。如此不但提高新聞正確性，也讓更正或改變訊息成為共同責任，而非僅是記者個人之責。此外，林翠絹

(2018) 研究新加坡《海峽時報》發現，該報讓新聞室編輯和記者將第一線記者傳回的資訊製成「第一版本的網路新聞搶先上傳」，之後再由第一線記者製作「深度的網路新聞」（同上引，頁 91）。藉此，該報清楚區隔網路與紙本新聞內容：網路新聞偏重「最新或最重要的資訊」，紙本新聞則偏向「深度分析或對背景細節的描述」（同上引，頁 93）。

而且，新聞查證需要人力及時間成本。若此成本超出記者個人在日常新聞產製中所能負擔的範圍，更需要新聞室支持。以調查報導為例，Ettema & Glasser (1985) 指出，記者須負起正當化 (justification) 報導的重擔，而首要之務便是將故事強力推銷給上司與同事，顯示自己手上握有的消息為真 (real) 且能做 (do-able)，可以產製出具影響力的新聞故事。

最後，無論新聞有誤或有假，新聞組織首當其衝須承擔相關法律訴訟、聲譽受損及喪失閱聽人信任等風險。因此，雖日常新聞產製可能如前所述，缺乏明確詳盡的查證慣例，但這不表示新聞組織沒有相關規定。根據 Kovach & Rosenstiel (2010, p. 89)，近年一些新聞組織對於使用匿名消息來源有較嚴格的內部規則，包含該消息是否真具新聞價值、該資訊是否能以其他方式獲得、消息來源所處位置是否真能獲知其提供的資訊，以及該消息來源的可信度紀錄等。而且，他們也強調，被保密的消息來源提供的應是事實，而非意見。劉蕙苓 (2014，頁 72-73) 也發現，其研究的三家國內新聞台皆有「網路新聞製播規範」，明載從網路取得新聞線索或畫面須「查證並限制比例」，只是新聞組織在實際運作上，常因截稿時間、新聞需求量及易得性高低而採「寬緊不一」的模糊作為。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2019 年 7 月 6 日，共邀訪 30 位當時或曾經任職四大報，主跑政治、財經、司法及教育線記者與報社主管，了解日常新聞查證實踐。本研究當時選擇四大報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四大報產製之新聞類型多元，包含紙本及網路新聞、日常新聞及專題報導等，使得查證需求及實踐變異較大。第二，四大報處於網路與紙本新聞共存之新舊媒體轉型期，透過研究新聞組織與記者的查證標準變化及實務應變，可一窺新聞查證之實踐核心。

本研究透過滾雪球法，成功訪問四大報新聞工作者之人數為《聯合報》

9 位（包含 1 位退休者）、《中國時報》7 位、《自由時報》5 位及《蘋果日報》9 位（包含 1 位轉職者）。此外，截至接受本研究訪談當時為止，30 位受訪者從事新聞工作之年資區間及人數如下：5 年（含）以下者 6 位、5 至 10 年者為 5 位，10 年（含）以上者為 19 位。在 19 位有 10 年（含）以上新聞資歷的受訪者中，有 9 位（曾）任主管職，提供本研究深入了解新聞組織對查證之要求及程序的機會。此外，接受本研究訪談的所有現任記者皆須同時供稿給即時及紙本新聞使用，雖然《蘋果日報》的作法與其他三報較為不同，之後本研究將詳細分析說明。

每位受訪者皆接受研究者約兩小時的面訪。訪談之前，研究者先蒐集或請受訪者提供查證個案，以利訪談聚焦。訪談內容主要包含新聞組織對查證之要求、組織及記者處理紙本及即時新聞之流程與標準、新聞組織與同業對記者查證之影響、（不）採取查證行動之考量，以及判斷證據輕重之標準等。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之後製成逐字稿，以利分析。以下摘錄訪談內容，將註明受訪者與過錄稿頁碼，以「IR」表示研究者提問，並在不傷害文意下，刪除贅字，以及用「某人」或「某某」替代可能透露受訪者身分之談話內容。受訪者代號先以其接受本研究訪談當時任職之報社英文字母開頭表示，用 U、C、L、A 分別代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若受訪者（曾）任主管職，則再以 S 標示，最後數字則是該報受訪者人數依序編號。例如 US1 表示受訪（曾）任《聯合報》主管職，是《聯合報》第一位受訪者；U2 為《聯合報》記者，為第二位《聯合報》受訪者。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組織角度出發，前兩部分先分析報社如何形成查證規範與實踐狀況，再從守門關卡設置及核稿者的路線知識等，探究即時與紙本日常新聞的查證標準差異。第三部分探析記者在前述產製設計下，查證一般日常新聞與即時新聞之實踐特徵。最後，本研究根據訪談結果，指出目前報社如何發揮組織優勢，協力查證，強調查證應為組織團隊之責，並藉此提升報導品質。

一、組織的查證慣例與規範強度

幾乎所有受訪者談及查證，便會提及要「避免被告」，新聞組織也是如

此。「正確無誤」是新聞組織決定新聞是否刊登的基本門檻，以《聯合報》為例，US1 (p. 22) 說：「即使在八版，如果出錯你還是會被告，所以會有一個門檻是決定要（做）或不做」。US9 (p. 27) 也認為凡新聞有涉法疑慮，報社就顯得更謹慎，力求「安全」，包含要求具名消息來源，抑或要訪問被質疑、被指控的當事人。

雖然查證如此重要，但根據本研究訪談，除了《蘋果日報》對「死訊不能搶快，一定要證實才能發」(AS5, p. 15)，其他三報受訪者皆表示報社未有查證的明文規定。即便報社可能出版編採手冊明載查證原則或方式，如《聯合報編採手冊》論及司法新聞撰寫「要有根據，即使因偵查不公開而拿不到書面資料，也要確定新聞內容與檢調人員的辦案卷證相符」(聯合報編輯部，n.d.，頁 61)，但所有受訪記者論及查證，卻未有一人主動提及任何類似編採手冊的組織規章。究其原因，可能如本研究之前文獻檢閱所述，主要受限於新聞工作經常處理模糊的問題、例外的個案 (Tunstall, 1971)，且在實務上，記者查證常視資訊敏感度、消息來源的可及性與可信度而定 (Wintterlin & Blöbaum, 2016)。而且，被問及報社是否提供新進記者查證相關之教育訓練時，僅有新聞資歷 15 年以上的少數受訪者表示自己初進報社曾經受訓，被要求「要做查證」(US6, p. 21)；L3 (p. 25) 也表示受訓期間，報社請「很厲害的記者」傳授新聞採訪寫作經驗，其中包含查證個案分享。

既少有查證的明文規定，也缺乏有系統的新聞查證訓練，那麼，報社是如何形成、傳遞，進而落實查證慣例？以下我們分別討論。

(一) 從個案經驗形成新聞查證慣例

根據本研究訪談，四大報的新聞查證慣例分別為：《蘋果日報》要求所有爆料新聞皆需雙重確認，且應盡可能訪問當事人；《聯合報》同樣強調須向新聞當事人查證，記者也提及報社要求「訪到當事人」(U3, p. 22)、「有個不成文規定，不管寫什麼都要有回應」(U4, p. 19)，要求平衡報導；《自由時報》雖無「特別規定」，但對爭議性高或負面新聞，一樣要求記者「一定要問到公司或當事人」(L3, p. 21)，抑或「要求訪兩造當事人，然後（取得）官方說法」(L5, p. 13)；《中國時報》同樣沒有明文規定，且多視「個別長官」而定 (C7, p. 21)，但也曾在《聯合報》服務的 C1 (p. 17) 認為兩報針對重大事件的查證要求「原則上都差不多」，不外乎「要求平衡，問當事人」。

簡言之，取得爭議事件的「當事人回應」顯然是四大報共通的新聞查證慣例，但在落實上，記者卻非一視同仁，而是視新聞當事人而定，包含視其是否可能興訟或否認報導內容：

報社被（某新聞人物）告過 n 次……以後所有（關於該新聞人物的）新聞一定要問到他回應才能出 (AS32, p. 40)。

這種東西（正面報導）通常不會告，出手沒關係……你縱使錯誤……（網路上許多不同版本資料）管它哪個版本……他們（指新聞當事人）都很低調，不會出來否認 (AS6, p. 11)。

事實上，如前文獻所述，新聞組織難以設定一套固定、可適用於所有新聞個案的查證標準或程序。而且，新聞查證慣例多在個案經驗中形成，如 AS6 (p. 16) 所說，新聞通常「出事（如被告）再回頭查那時候是怎麼寫的」。以前述《蘋果日報》規定「死訊不搶快」為例，根據 AS5 (p. 15)，其可能是從他報誤傳李光耀病逝後：「報社就說以後這種名人死訊，我們沒有要搶快，就是一定要查到，因為那個錯太嚴重」。

一旦遇到足以形成或須再次強化「查證慣例」的個案，新聞組織主管便會透過個案「小故事」，向記者提醒查證之「大道理」。如《聯合報》政治記者 U2 (p. 12) 指出，主管會以「後來證明有錯誤或是有些爭議」的新聞，「不斷提醒」記者：「對政治人物講話，永遠要抱持質疑的態度」U8 (p. 34)。也提及主管會在通訊軟體群組中轉貼高層指示，提醒記者查證的重要。另外，A22 表示，《蘋果日報》高層曾在給全體員工的信中強調「內容都一定要查證，也不能抄別人的新聞，我們必須全部都要自己問到」。亦即，四大報的查證規範落實主要依賴主管與記者的互動實踐。如 A22 指出：

（如果）我們只有三分把握，我還沒得到當事人的確認，我們長官就會告訴我，你先把大概好的稿子給他（主管），等到他（當事人）回電後，再跟我說，我再發稿出去。就是他也會再三跟我確認說東西是對的……不能有錯字，對我們非常嚴 (A22, pp. 14-15)。

當然，報社也可透過解雇員工的權力 (Shoemaker & Vos, 2009)，設立並強化組織的查證規範。例如兩位《蘋果日報》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及報社曾解雇謊

稱資料得自專家訪問的記者，藉此讓記者知道組織標準如「不能夠寫沒有做的事情」(A8, p. 10)，更將之廣為周知：「發通告，讓所有人知道沒有查證的後果就是如此」(AS3, p. 11)。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個案」又成為組織警惕記者必須查證的「故事」，只是接受本研究訪談的另外三報記者皆未提及類似「故事」。

(二) 視新聞重要性決定守門寬鬆程度

查證慣例在新聞個案中形成與強化，但也允許例外。事實上，慣例準則在守門人決定「重要新聞」時才有較大影響力 (Shoemaker & Vos, 2009, p. 52)，新聞查證也是如此。因此，對於一般日常新聞或「比較簡單」的新聞稿 (AS1, p. 3)，主管並不費心把關。除非新聞有爭議或影響性大，否則主管鮮少過問記者的消息來源或查證過程，例如受訪記者說：

遇到重大新聞，顯而易見知道這個新聞沒有查證會出大包，會出大事的這種新聞的時候，（主管）就會打電話問一下 (C3, p. 21)。

越敏感（長官）越會問（消息來源是誰）……很敏感的指控，譬如說弊案，那就一定會問，他就會問你消息來源是誰 (U3, p. 24)。

換言之，在日常新聞產製上，主管對路線記者查證一事多抱持信任態度，並未如 Lasorsa & Dai (2007) 所建議的，「信任與懷疑並存」。進而，本研究發現新聞組織偏向將一般新聞查證之責置於記者個人，反而鬆懈組織守門之責。其因有三：第一，查證被認為是記者的基本工作，是基礎的新聞訓練，故新聞組織處理的是記者已證實的新聞事件，而非無事實基礎、紛亂的事件訊息。第二，新聞組織佈線成網，藉此快速蒐集可滿足新聞消費者需求的新聞素材，填滿新聞版面 (Tuchman, 1978)。而將記者分派至不同路線，讓記者身處第一線，同時花大部分時間與線上消息來源往來，記者便能快速、準確地蒐集、判斷與查證資料。因此，所有受訪者都認為路線記者才是最了解線上狀況之人，即使內勤主管是資深記者也認為自己「久沒有跑線，還是要相信記者」(AS6, p. 80)。第三，記者掛名報導表示其須對自己報導的新聞

負責，無論是認知到新聞影響力，或為避免訴訟及維護自己名聲。尤其記者名聲無論在組織內外都極重要：對外，記者重視同業對自己的評價，而記者名聲也會影響同業是否決定跟進該記者的報導 (U4, p. 11; AS5, p. 16)，甚至是否要與其合作 (AS5, p. 53)；對內，記者報導是否確實、可信，也影響「長官對記者的信任」(C3, p. 22; C7, p. 18; LS1, p. 30)。本研究也發現，與記者判斷消息來源可信度相似，主管對記者的「信任」同樣根基在記者聲譽、過去報導的準確度、平常做新聞的方式、稿件是否完整及通順等 (U2, p. 7; U12, p. 6; C3, p. 22; LS1, p. 30)。而且，在日常互動中，主管較少使用「查證」或「證據」等詞，更多是要記者確認理解無誤、理清稿件邏輯、補充具體細節或確定用字正確，如以下受訪者所述：

我的長官通常不會質疑我：「你是不是這個查證好像有點怪」，或說「你這個查證是不是不夠」，或是質問你跟誰查證，通常不會。但通常他們看你寫的新聞，覺得好像哪裡不夠清楚，他們會希望你補問細節 (U8, p. 34)。

問得非常細……當事人、律師、房子外觀、現場照片、鄰居說法……因為主管覺得他要知道這些細節才會安心 (A9, p. 16)。

他（主管）會覺得邏輯有點不通，要不要邏輯弄得更（清楚）(C4, p. 45)。

另一方面，雖然組織偏向將日常新聞查證之責歸於記者個人，但當記者遇到過於敏感或重大新聞，同時涉及新聞競爭，自己又無法按照慣例完成查證時，他／她也會將是否處理或刊出的決策責任交付主管，分攤責任：

是不是這個人？照片很多，很難兜起來，這時候就是叫副總陪你一起賭。就是我只能問到這樣子，你（指副總）自己決定 (C3, p. 18)。

新聞已經蠻完整（指已交叉查證，有兩個消息來源「印證」該事，同時也有官方說法），就差當事人。我就問長官我們是不是晚點出？他就說沒關係可以先出 (A4, p. 32)。

綜上所述，日常新聞查證在四大報中被當成一種「慣例」。這些查證慣例多在新聞個案中成形、強化，不但少有明文規定，多賴主管與記者的互動傳遞，查證更被視為記者個人之責，依賴記者的個人判斷，隨其「伺機而動」。唯有碰到「重要新聞」，新聞組織才會較嚴格地確認查證慣例。然而，本研究認為，「新聞查證與否及程度判斷」過度依賴個別記者的結果便可能導致接受單一消息來源（Shapiro et al., 2013）、查證不全（江靜之，2016 年 6 月），甚至流於形式（劉蕙苓，2014）。而這樣的狀況也可從以下報社對即時與紙本日常新聞的查證標準差異，一窺究竟。

二、即時與紙本日常新聞的查證標準差異

雖然大多數時候，報社如資深司法記者 A8 所說，是基於對記者的「信任」，相信記者會照組織規章行事，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慣例須落實於組織守門過程中，就像 A8 (p. 11) 緊接著說：「說實話，我們每天稿子回去，裡面當然是有人看，不只一關看」。

一般日常新聞通常由一位主管確認即可，但越重大的新聞事件，例如頭版新聞，經過的守門關卡越多：「頭版頭的稿，主任看完以後，副總一定會看一遍」(A9, p. 7)。因此，從守門關卡多寡及主管守門標準來看紙本與即時新聞，便不難了解為何除了《蘋果日報》，其他三報受訪記者多認為自己報社對紙本新聞的查證要求高於即時新聞。U8 以下描述尤為清楚：

以即時來說（主管）很少會問（是否無誤），就是很偶爾。紙本就是每天一定會問……紙本會有層層把關，我上去會有召集人或組長，然後組長看完主任看，主任看完副總看，副總看完、編輯編完。……但是即時不是，因為即時只經過一關就出去了 (U8, p. 33)。

以《聯合報》來看，US1 (p. 18) 受訪坦言，無法對即時新聞做太多要求，除非可能引發訴訟、影響報社聲譽，「真的關係到生死」方會「喊停」。U4 (p. 19) 也認為報社對紙本的查證要求高於即時新聞，因為「主管會覺得（紙本新聞）譬如說至少兩個人的回應，可是即時就不需要。」《中國時報》也是如此，C7 (p. 20) 認為報社對即時新聞的控管一般來說較紙本新聞「鬆」；C1 (p. 19) 也表示：「通常報社會這麼（查證）要求嚴格，都是放在紙本」。

《自由時報》記者 L3 (p. 12) 更說：「聽到（長官說）發即時就知道，就是不重要」，或 L5 (p. 14) 以軟性新聞為例指出：「他（長官）覺得沒有要登到日報，然後即時也不是很重要的一種新聞，就會省略訪當事人這個步驟」。

簡言之，報社對新聞查證慣例的要求及落實，包含上述紙本與即時新聞查證標準的差異，反映在新聞守門關卡多寡、核稿者與路線記者的互動中。例如 AS5 (p. 35) 提及核稿主管的把關責任：「必須做新聞判斷，判斷記者查證夠不夠，不夠的話就要擋下來，要求他（記者）再繼續」。作為主管，US1 也對自己的影響力了然於心：

比如你平常就很嚴格，一直打槍記者……（記者便會）蒐集比較多東西才呈給你。但你平常很容易隨著記者……他們可能會被鼓舞，然後覺得差不多這樣就可以報回去，反正你也會用 (US1, p. 17)。

另方面，從記者角度來看，為避免「被追問」(A4, p. 34)，甚至花時間解釋、「說服」主管 (U4, p. 33; L5, p. 34)，最快、最好的方式自然是依之前經驗，設想核稿主管可能提出的問題或要求，預先準備及完成任務，其中當然包含蒐集資料證據：

長官會打電話問我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要是模糊帶過，長官一定會打來，我就會有壓力。我就想我還是寫清楚一點、多查一點 (U3, p. 25)。

盡量把故事講清楚，然後我自己不理解、不清楚的，如果不是關鍵，我寧可省略，不要為了完整丟回去，結果有些東西你（內勤主管）問，我都答不出來，給自己找麻煩 (A8, p. 19)。

總而言之，雖然新聞組織偏向將日常新聞查證之責置於記者個人，多依賴記者個人（對是否需要查證及查證程度）的判斷與決策，但實際上，記者卻是從守門關卡了解、學習組織的查證慣例、標準及彈性空間。因此，報社對即時及紙本新聞的守門設計、核稿者的安排等「管理決策」深切影響記者對即時及紙本新聞的查證實踐。以下我們從四大報即時與紙本日常新聞的守門關卡設置、核稿者的路線知識等，探析即時新聞查證較紙本新聞不足之因。

（一）從「先即時，後紙本」到新聞類型區隔

過去研究如王毓莉（2016）、彭慧明（2016）已對四大報即時新聞中心設置及運作方式有詳細介紹，本研究無須在此贅述。不過，2018 年上半年本研究執行訪談期間，正值《蘋果日報》將內勤主管依紙本與即時新聞一分为二之時：即時新聞主管統轄記者，紙本新聞主管則整併、改寫即時新聞。紙本新聞主管可在下午編輯會議後提出需求，再由即時新聞主管聯絡記者，請求增補內容，但新增內容依然先刊登於即時。根據 AS6，此舉希望降低路線記者的工作負擔，雖然也曾發生紙本新聞改寫「抓不到新聞中心點」或抓錯更新稿件的狀況。不過，對記者來說，報社是以即時新聞為主。即時新聞等同日常新聞的「稿單」（A7, p. 36），故記者寫稿時希望盡量完整：

我們就是全力發即時，所以現在大家即時就盡量寫完整，讓紙本從裡面挑他要的，也不要再跟我問什麼（A8, p. 19）。

《蘋果日報》即時新聞是將「查證」與「刊登」並行，截然不同於傳統紙本新聞「完成查證再刊登」的作法。AS6（p. 23）如此解釋該報即時新聞的操作方式：

即時就是分階段。（即時）新聞出去之後，我們會同步跟記者講要去查證。（如果）查證還沒回來，會加一句話：「還沒有得到某某回應」，等到出來後再更新說某某已經回應。

因此，對《蘋果日報》來說，紙本新聞是前一天即時新聞完成查證後的「成品」。即使紙本新聞有新增內容，也多是「錦上添花」，較無涉查證需求。受訪者表示：

紙本要出的時候，所有東西該問都問完了，該查證都查證了……它（紙本）會有一點擴充的東西，可能是背景資料或是多一個人講話……你應該做的查證在即時出手那一瞬間，在那（紙本刊出）之前都已經做好了，所以（紙本新聞）就不太會有需要再多查證的問題（A7, p. 18）。

即時已經處理差不多，紙本再處理，相對出錯機會就小很多

(A8, p. 13)。

而且，紙本新聞也避免選用查證不足的即時新聞。AS1 (p. 4) 提及某則即時新聞未獲當事人回應便刊出：「這有點理虧，那個稿子我們紙本就沒有用了」。(至於即時新聞為何出現查證不足的新聞，本研究之後再行討論) AS5 也強調：

紙本會要這個新聞已經證明這個新聞是事實……證明它（指報社）覺得這條新聞是真的。不可能即時是錯的消息，報紙再登一次。所以它一定覺得即時新聞看起來已經查證完整了，才印報紙 (AS5, p. 30)。

此外，《蘋果日報》於 2019 年取消記者可自行出版即時新聞的作法，A7 (p. 16) 指出記者的即時新聞稿件「都要給內勤核稿」。而內勤核稿者「都是副總層級的人」(AS1, p. 5)，擁有較深新聞資歷，且審核的稿件也是其熟悉的路線 (AS5, p. 44)，故較能發揮查證的守門功能。雖然 A9 認為內勤「很多時候其實就是看完下標就出去」(A9, p. 5)，但 A7 表示內勤除了幫忙改標題，也會看內容。A8 也說內勤編輯「會幫你順一下，有哪些地方需要補問的、要寫清楚的，他會看一下」(A8, p. 11)，甚至刊出後：

我們單位主管還會再回頭看，因為即時有時候還要更新……總之即時新聞不是記者寫完出去，裡面一個人看了出稿完就沒事 (A8, pp. 12-13)。

除了核稿者的專業知識背景，核稿者人數與工作量配置也影響新聞處理速度與品質。A7 指出《蘋果日報》的核稿人員較多，故能較快刊出；曾擔任即時新聞核稿的 AS5 (p. 39) 也表示「平日會有兩、三個人一起審」。

從上可知，即時新聞已成《蘋果日報》的日常新聞，至於紙本新聞則如 AS6 (p. 80) 所述：「紙本通常要的東西都比較細……《蘋果》已經在改版成要做專題式」。事實上，也有其他受訪者（如 U2、U8）認為自己報社的日常新聞是以即時為主，紙本新聞逐漸走向深度報導或專題形式。而這樣的區分走向似乎與新加坡《海峽時報》相似（林翠絹，2018）。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認為，一旦網路即時（日常新聞）與紙本（專題、深度報導）新聞在新聞類型上作出區隔，則後者的查證需求及標準自然如 Ettema & Glasser

(1985) 所說地高於前者。例如 C6 (p. 14) 認為紙本新聞通常對查證「比較有需求」；U4 (p. 15) 也表示目前紙本新聞幾乎沒有「不需要查證就可以出手」。換言之，新聞查證需求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新聞類型（如日常新聞、專題、深度報導或本文之後述及的快訊），而非媒介型態（如網路即時或紙本新聞）。

（二）從路線資深記者作為核稿主管到一般核稿者

根據本研究訪談，《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的紙本新聞所經關卡不但多於即時新聞，紙本新聞核稿者（如組長、主任或副總編輯）通常是資深記者，在其長期耕耘的路線上，擁有區辨資訊內容的「領域知識」，以及能回應特定時空條件的「情境知識」（陳百齡，2004，頁 45）。A9 (p. 6) 便表示，若核稿者缺乏上述知識，「只專注在文句、錯字，可能會忽略（新聞）文章講的對不對，是真還是假」。資深政治記者 LS1 (p. 28) 也認為：

「主管（如果）是這條路線的資深記者，會運用自己的經驗判斷還可以找誰補強，做雙重確認……甚至他會覺得事情可能不是這樣，他有自己的消息管道，他會存疑。」

司法記者 U7 (p. 52) 也說：

「（紙本新聞）長官一定是跑我們路線出身的……他看就知道這樣真不真、假不假，是不是對的，有沒有可能哪邊怪怪的。」進而，紙本新聞核稿者也可能考量版面需求後，要求記者再啓查證工作（LS1, p. 31）。

然而，三大報即時新聞內勤人員不一定是具備路線情境與領域知識的資深記者。例如於本研究訪談當時，《中國時報》即時新聞是由即時新聞中心編輯把關：

（即時新聞）沒有內部審稿長官，我們直接出給即時新聞中心編輯。……挑錯字，很快看，但他不一定挑得出來，裡面的稿量太多（C3, p. 20）。

C2 甚至認為即時新聞中心編輯「有很多可能沒跑過新聞」，不具備修改

記者稿件的能力，故應只協助記者確認錯字或漏字等技術問題，而非提出質疑：

內勤應該要做的工作是幫你看稿子，比如說我們即時第一關打很快，會漏字會錯字，他應該幫你做這個事情就好。可是現在即時新聞比較強勢以後……就會變成喜歡質疑記者的稿子，甚至會幫你改 (C2, p. 3)。

《自由時報》與《聯合報》的即時新聞核稿者雖可能是資深記者，但由於「隔線如隔山」，若人力不足，處理自己不熟悉的路線稿件時，便無法充分發揮查證的守門效果。根據本研究訪談，一般來說，即時新聞核稿者若非該路線資深記者，便較少提問，且問題偏向技術層次，所重之處也多在技術層面，如挑錯字、格式錯誤等：

裡面有核稿，但是那個核稿要看所有中心的稿子。他不見得是這方面專業，所以通常是你寫了，他頂多看有沒有錯字就出去了。他也不會質疑內容或你的邏輯是不對的，但是你的（紙本）長官會 (L3, p. 14)。

他的問題都很簡單，我可以大概半小時內解決。譬如跟你要一張照片，或者是「你寫的是什麼意思？我看不太懂」，或者是「我標題可以這樣下嗎」 (U4, p. 27)？

簡言之，若即時新聞核稿者並非該路線的資深記者，同時又要處理大量稿件，他／她便傾向著重新聞的表面正確性（如是否漏字或出現錯字），或提出以常識便足以判斷的概念或邏輯不清問題（如語句是否通順或是否出現艱深的專有名詞）。至於消息來源與內容是否可信、足夠，或具有權威等，缺乏路線領域及情境知識的核稿人員較無法判斷，守門的查證功能自然較為不足。

三、記者的日常新聞查證實踐特性

如前分析所述，一般日常新聞查證多賴（經新聞室社會化之）記者個人的判斷及實踐，那麼記者的日常新聞查證實踐狀況究竟如何？探討此問題之

前，我們必須先擱置「日常新聞查證不足」的刻板印象，回到日常新聞特質及產製流程設計等限制，進行討論。

（一）一般日常新聞查證

根據本研究訪談，所有記者皆認為查證能讓自己「免於訴訟並維護名聲」。而且，記者向路線上經常往來的消息來源查證也可證明自己已盡本份，緩和消息來源對報導內容的不滿(C5, p. 30; C4, p. 14)。事實上，Barnoy & Reich (2019) 研究以色列記者報導日常新聞時發現，記者查證頻率約有五成。Diekerhof & Bakker (2012) 也指出，若查證可以快又便捷，記者會傾向採取查證行動。

不過，本研究發現，日常新聞產製有以下三項特徵，使得記者的查證活動不顯著，且常止於有限的查證。首先，日常新聞經常處理 Tuchman (1973) 所說的突發及發展中新聞。這些新聞類型的資訊無法在事件發生前預先得知，故記者所作多是忠實記錄當下所得之事實資訊，查證需求低且簡單。舉例來說，新聞事件的現場報導（如抗議現場、立院質詢等），由於記者在場，故多被受訪記者視為無須查證的「現場紀錄」；報導公開資料（如司法書類、名人臉書）也因有消息來源可供引述，大幅降低記者查證的需要與責任。

其次，新聞組織佈線讓記者經營路線新聞，易於取得新聞素材及判斷真偽，也讓他／她能快且準確地查證新聞。因此，向線上消息來源查證一般日常新聞，對記者來說可謂舉手之勞，如 A22 (p. 11) 說：「獨家才比較困難……一般 daily 都不難，你只要願意多打幾通電話就可以得到答案」C2 (p. 15)。也述及因認識新聞當事人，只要打電話：「直接問就好了，這麼簡單就一定要做」。也因如此，資料蒐集與查證活動相互交織，實難清楚區隔 (Shapiro et al., 2013)。如同 A4 (p. 51) 被要求估算日常新聞的查證比例時坦言：「我覺得比例很大，但是我形容不出有多少比例……只要有發生事情我就會想打電話問，好像變成一個例行（之事）」。

其三，記者查證經常受限於路線上的消息來源。尤其「訪問權威消息來源」常被視為新聞查證慣例之一 (Tuchman, 1978)。路線上的權威消息來源通常已讓日常新聞取得保證，且記者認識、相信大部分消息來源，常認為無須再確認消息來源提供的訊息 (Machill & Beiler, 2009)。《聯合報》主管 US1 便明白指出，記者「能查證的很有限」，因為路線記者通常只要證明報

導內容正確，不會被線上消息來源否認即可：

對記者來說，他面對的就是那一條線……基本上我（記者）只要確認我記錄是正確的，我基本上相信他說的是真的。但是很多新聞牽扯到線跟線的差異 (US1, pp. 16-17)。

簡言之，一般日常新聞查證需求可能便不高，而且記者查證日常新聞多依賴路線上經常往來的消息來源，可有效率地完成查證工作。然而，本研究認為，記者若過度依賴、信任線上消息來源也可能導致查證流於形式，甚至無效。此時新聞組織若又如本研究之前分析所言，將日常新聞查證之責歸於記者個人，便容易出現查證不實的情況。而這些問題在即時新聞查證上更為明顯，以下繼續分析。

（二）即時新聞查證

一般日常新聞的查證活動已經相當有限且不顯著。而即時新聞因網路版面空間無限，加上可隨時更新，讓「查證」可與「刊登」並行，使得即時新聞查證在實際操作上，顯現以下幾項特徵。

首先，Gowing（2009）曾說日常新聞常面臨「F3 困境」，亦即記者是在「搶快」（Fast）、「爭先」（First）之餘，再考慮能接受多少錯誤或不正確的資訊「瑕疵」（Flawed）。而根據本研究訪談，「F3 困境」在即時新聞上尤為顯著且更趨極端：一來即時新聞以快為尊，「搶快」成為首要考量；二來包含社群媒體在內的所有媒體都能在網路上發布訊息，使得「爭先」報導的競爭壓力大增；三來因為即時新聞可隨時修正、更新，也提高接受資訊「瑕疵」的容忍度。更重要的是，即時新聞的「F3 困境」主要透過新聞組織強化，施加於記者身上。舉例來說，報社主管看見他報刊登，但自家報社記者卻未報導的即時新聞，會將他報即時新聞轉貼在群組中，要求記者跟進 (U8, p. 27; LS1, p. 52; C7, p. 14)。而在組織催稿下，A8 (p. 19) 坦承「比較容易出錯」。《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受訪者也表示：

純粹以即時新聞來講，能查證的能力會比較差，一定的。因為有時候真的有時壓力……比如說 A 指控馬英九，這個東西你要怎麼查證？你也不能瞬間打給馬英九，你也做不到。可是同業都在

發的時候，你不發，你家的長官問：「你發了沒？」「哦，沒有啦，我要等什麼查證。」他一定打死你。你還不發 (C1, p. 15) ？

我們的（即時新聞）壓力是來自於別報發即時了，主管會要你趕快跟一下，我們心裡會有壓力。第二個是我們會把發即時當作考績的一部份，占的比例也許不一定，因為不斷在調整 (LS1, p. 52) 。

你也不可能說：「長官，我覺得這個還不行寫，你再給我一個小時。」不可能。你就黑掉了。他們會覺得這哪裡即時？這不即時了嘛 (U7, p. 24) 。

「F3 困境」同樣出現在《蘋果日報》的即時新聞處理上。雖然該報如前所述，在新聞守門關卡（將記者直接歸於即時新聞主管管轄）及核稿主管配置（核稿主管為路線資深記者且人數較多）上不同於其他三報，似乎可減緩即時新聞對查證的負面影響。不過，根據本研究訪談，在此資訊爆炸的時代，《蘋果日報》記者傾向認為自己每日處理的資訊量大增，平日的工作負擔也增加，如 AS5 (p. 46) 表示，自己上午處理即時新聞，下午要補紙本新聞需要的訊息：「一整天都要發稿」，使得自己較難有時間與消息來源「聊天」；A4 (p. 20) 也表示自己除了日常新聞，很多時候還要處理許多報社交辦的資訊整理工作。因此，除非查證快又簡單，否則他偏向立即報導：「必須趕快出手，我想要把我的工作一件一件處理掉」。

其次，不可否認的是，如同 Kovach & Rosenstiel (2010, pp. 100-102) 指出，事實有不同層次，對證據的需求也有異，例如簡單、無爭議的新聞資訊，即使證據量不多或僅有間接證據也無傷大雅；或是閱聽人在事件發生當下因亟需即時資訊，故較能接受新聞提供不確定、混亂的資訊。亦即，並非所有新聞在所有時間點上皆有相同的查證需求。尤其突發及發展中的日常新聞已成「即時新聞」報導的大宗，加上即時新聞容許少量訊息，記者只要掌握突發或發展中新聞當時（發展中新聞會隨時間而變）提供的表面基礎事實，如「人事時地物」，便可「搶快先出」。因此，即時新聞被一些受訪記者視為「訊息告知」的快訊 (U3, p. 27; C6, p. 14; L3, p. 16)，也使得記者角色偏向「紀錄者」（劉蕙苓，2018，頁 56）。因為一旦成為「紀錄者」，記者便可聚焦於

表面事實，將查證需求降至最低，只求避免錯字、人名或地名誤植等表面事實錯誤，便可源源不絕地快速供應新聞。

然而，這也使得即時新聞不免流於「表面」或「表象」敘述（C7, p. 23; A9, p. 8）。另有不少受訪記者自承因要「搶快」、「爭先」，加上組織對即時新聞的把關不如紙本新聞嚴謹，致使即時新聞出錯的比例高於紙本新聞。此外，即便是無須查證的現場活動或公開資料，即時新聞追分趕秒的結果，一方面壓縮記者消化訊息的時間，如司法記者 L5（pp. 5-6）以法院判決書為例說道：「很難在短時間內把它整理周全」；另一方面縮短記者的寫作時間，記者只能力保不要出現錯字等表面錯誤，如 AS5（p. 13）述及自己撰寫即時新聞：「就是從頭寫到尾，看過一次，有沒有錯字就出去」。

最後，由於即時新聞沒有版面限制，若遇上報社的即時新聞守門寬鬆，有些記者便將即時新聞當成與消息來源培養關係的工具。此類無涉第三方利益，類似公關稿的即時新聞，對記者來說並無查證必要。例如受訪者提及：

你要維持跟採訪對象的關係……說真的紙本現在很難上……有一些比方說很公關……所以你就是透過即時，因為即時沒有篇幅限制，你可以幫他上（新聞）（C3, p. 6）。

綜上所述，在即時新聞以快為尊、力求爭得先機，且能持續更新的運作邏輯下，查證可能便如 AS6（p. 23）所言：「基本上都變得非常微弱，甚至還沒查證就先出手，事後再去補查證」。而且，這些對新聞查證的負面影響主要透過新聞組織施加於記者，進一步可能使得新聞報導流於表面、記者無法等待掌握更多有利挖掘內幕的訊息便進行報導、權威消息來源更易取得發言權，以及新聞錯誤率增加等。

當然，報社對此也非毫無警覺。舉例來說，L2（p. 27）認為，不同於「早期即時新聞剛起步」之時，《自由時報》如今願意給記者較多時間查證，「因為裡面即時長官也發現即時的出錯率太高」。進而，L2 接著表示，該報為降低記者的即時新聞點閱率壓力，另設「即時新聞內勤」人員，負責整理及包裝在網路上發現「很有梗」，但自家記者未報導的新聞。這些刊出時「沒有記者名字」的即時新聞處理網路上源源不絕的巨量資訊，主要目標為「衝點閱率」，讓記者能專注於路線上發生的新聞。

上述《自由時報》的作法看起來似乎可以減緩即時新聞對記者造成的壓力，但整體而言是否能提升即時新聞品質則尚未可知，尤其這些社群編輯的

新聞挑選與判斷可能如劉昌德（2020）研究指出，是截然不同於傳統新聞專業判準。更重要的是，如本研究之前強調，新聞組織不應只將日常新聞查證責任置於記者個人，而應積極發揮組織優勢，將新聞查證視為團隊之事。以下繼續討論。

四、發揮組織優勢的協力查證

從本研究之前分析可知，查證慣例的形成、傳遞及落實多有賴主管、核稿者與路線記者的互動。事實上，US1（p. 16）也強調「發動求證，或者（查證）要到甚麼程度」，此事主要取決於主管。而主管除了如前所述，可落實組織的查證慣例，更可協助記者判斷資料真偽、提供或運用自己的人脈關係進行查證，以及協調跨線查證，提升報導品質並強化新聞的核心價值。

（一）主管協助

擁有路線領域與情境知識的核稿主管可透過「問問題」，向記者確認報導的正確度與真實性。領域知識如司法新聞常涉及司法體系人員分工、權責及法律概念等（U8, p. 48）；情境知識如政治新聞常須判斷線上消息來源特質與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如 AS5 說：

有些受訪者容易誇大其辭，三分話講成七分……當我發現這個政策很重要或是這件事情很重要，他（指記者）只有這個受訪者轉述，但我又覺得怪怪的時候，我就會要求他……再問更高層（AS5, p. 41）。

有時候你要教他（新進記者）這個人他背後是誰，他為的是什麼（AS5, p. 42）。

此外，記者可能偏向自己路線「單一思考」（AS1, p. 6），此時主管便可幫助記者避免被線上的消息來源同化（co-opted），或要求記者跳脫消息來源偏好的例行基本規範（routine ground rules）（Shoemaker & Reese, 1996, p. 140）。例如 U4（p. 22）提及主管曾詢問自己「因為太習慣所以沒想過」的問題，因此她再回頭問消息來源。

本研究也發現，不像記者與線上消息來源來往頻繁，核稿主管由於不在新聞現場，較無法或無須考慮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維持，以及與「人」有關的訊息（如消息來源信譽），有時反而能聚焦於「事」，質疑消息來源提供的訊息或要求。舉例來說，AS6 提及記者回報消息來源不願具名，但她從新聞發展角度思考，不願接受：

傳言傳來傳去已經第三天了，如果今天是第一天我還容忍，因為我想知道事情真相……同事打給我說某人願意講，但是他不願意掛（名）。我就說：「你去跟他說，如果他不願意掛名的話，這篇稿子我不讓你出」（AS6, p. 37）。

最後，受訪記者經常提及的主管協助包含提示記者可查證的消息來源，或提供、甚至直接動用自己的人脈資源。例如：

我不曉得問誰的時候，他會提供他的人脈，這很重要。或者是他看到的時候，他告訴你，我可以幫你問誰，他可以站在協助你的立場（C7, p. 19）。

報社記者有很大的後援系統，就是今天我覺得這則是新聞，但是我可能問到的消息來源很少，長官會幫我問。他一定會有他的內線去問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U3, pp. 21-22）。

尤其報社主管可能認識，進而聯絡記者無法觸及的高層人士。何況有些消息來源如 AS1（p. 9）所說：「可能會給長官訊息，不一定會給記者訊息」。C5（p. 14）也表示：

有一些特定高層可能我們記者沒有辦法直接連絡上，或者有可能都是這個人之下的窗口。但是組織某些管理階層以上，比如副總、總編層級，他可以直接跟這個人對話，有更直接的管道求證。

（二）跨線查證

雖從組織分工及人員配置來看，《蘋果日報》似乎較其他三報更以即時為先，但從本研究之前分析也不難看出，四大報對紙本新聞查證的要求及品

質皆高於即時新聞。這也可從組織協力查證的頻率一窺究竟。例如 A9 (p. 17) 表示雖然《蘋果日報》記者「原則上不寫紙本」，然一旦記者的即時新聞被選為紙本頭版新聞，則記者「還是要自己寫，因為它可能會要更多查證、更多配合」。頭版新聞可謂是「團隊合作的成果」。相對來說，即時新聞大多是記者個人的新聞成品，因此也多如 C1 (p. 21) 所說，「不太可能」動用組織的跨線支援。

然而，有些新聞需要不同來源的資訊交叉確認、查證，方能了解問題所在或判斷真偽：

有時候查證不是在原本的線裡面，而是 double check，因為這個事情牽扯到好幾方，所以你可能就由另外的線來（進行查證）(US1, pp. 1-2)。

（主管）會確認我這邊的回應和說法，跟那邊（指另一路線記者給的訊息）的出入是不是太大，這件事情是不是有矛盾，再決定訊息的真偽跟來源是不是有問題 (C5, p. 13)。

雖然個別記者也可提出跨線查證要求，或與同組熟識的記者相互合作，不一定要經過主管，但跨線協力查證主要由主管發動：

通常我們報社的習慣是，你知道一個消息以後，你就回報給上面，就是組長、副主任。然後他有權力決定要不要請其他單位幫你配合查證，他有權力去問 (L2, p. 20)。

我也可以打給他（同組記者），但是我會儘量透過主任。這讓人家（同組記者）覺得這至少是公司的事……而且看版的是主任，他知道版面長什麼樣子和公司要什麼，而不是我 (C1, p. 20)。

因此，偵測跨線查證需求及協調記者分頭查證，也是主管的任務之一。尤其遇到較難查證的新聞事件，如 AS6 (p. 16) 表示：「很難查證的（新聞），要調度大家，你要大家幫忙想辦法查證」。

本研究所有受訪記者都有協助組織進行跨線查證的經驗，其中又以「問回應」為大宗。例如 U4 因負責線區較廣，幾乎「每天都會」接到跨線協助的指令；AS1 (p. 17) 表示跨線查證「非常頻繁」；C3 (p. 23) 也認為重大

新聞議題通常都需要協力查證，而且「現在很多新聞其實是跨路線的查證，不管是同組裡面的不同路線協助查證，或者跨部門」。

除了問官方回應，跨線查證的協作方式包含探聽消息（如 C3）、交叉確認（如 L2）、按照新聞事件的機構程序或發展軌跡分頭查證持續式新聞（如 A9），甚至從跨線查證中發現更多資訊，進而改變原來的新聞設計（如 U3）：

那天下午傳出這個新聞，然後府院記者繞了一圈也問不到。那時候他（新聞當事人）在外銀工作，所以到六點多的時候，老闆才跟我說，你去打聽一下（C3, p. 18）。

他（負責金管會路線的記者）跟我說（金管會）官員沒否認是這四家（銀行）……官員沒否認，這件事就可以寫了（L2, p. 22）。

（查要被槍決的死刑犯是誰）有的是我這邊（看守所）問，因為這時候名單已經在看守所，有些是高檢署那邊同事去問，因為那邊有執行令，還有法務部同事去問，法務部是法務部長簽的，三邊就去（查）到底是誰（A9, p. 27）。

沒想到本來要做配稿的經濟部記者反而問到實際內容，然後變成那個提到頭版去。變成他是主稿，我變成配稿（U3, p. 30）。

值得注意的是，對需要協助的記者來說，跨線查證是新聞組織資源，他／她不用「自己埋著頭去查證」（L4, p. 15），事倍功半。不過，對於接到協助指令的記者來說，其配合度可能就如 LS1（p. 31）所說：「很難掌握」。AS6（p. 5）也提及自己一直告訴記者：

能夠查證大家一起幫忙，讓一個新聞出去就好，不要在意那個不是你的線……你若單靠主線（記者），（他／她主跑的）這家公司又很封閉，不願意講任何話，那新聞怎麼做？

或許也因如此，本研究發現組內合作的容易度大於組間合作。就組內合作言之，因為組長可指揮該組所有路線記者，且組內記者互動較頻繁，對線上消息來源也不會一無所知。例如因有代班制，主線記者若放假，可由代班

記者代為連絡，故路線上的公關人員也不會只認識主線記者，而是「認識整組人」(AS6, p. 5)。而跨組／中心合作涉及組織內部的橫向聯繫，變數較大。曾在《聯合報》服務的 C1 (p. 17) 表示在《中國時報》跨線請求查證的結果經常是「問不到」、「他不要幫忙」或是「不了了之」，但《聯合報》較易協調記者合作，所以他認為在《聯合報》協力查證「比較容易」。

伍、結語

無論是現在或未來，「查證」都是新聞組織的核心價值。不同於過往新聞查證研究多聚焦於記者個人，本研究以四大報為例，深度訪談 30 位報社記者與主管，從組織角度探析日常新聞查證慣例與實踐。

(一) 結論與討論

如同 Gowing (2009) 所說，記者身處「搶快」、「爭先」及能忍受多少新聞錯誤或不正確資訊「瑕疵」的「F3 困境」中。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忽略新聞組織在其中扮演的樞紐角色，因為新聞組織可為記者設下「忍受新聞錯誤或不正確資訊瑕疵」的程度標準，減緩或增加「搶快」、「爭先」的壓力。例如「死訊一定要經證實才能刊出」的組織政策為記者在報導名人死訊時，去除了即時新聞求快、搶先的新聞競爭壓力。

本研究發現，四大報記者受訪時，未有一人主動提及報社對於新聞查證的明文規範。對記者來說，「查證」是起於新聞個案，並在組織故事、與主管／核稿者的互動過程中成形與改變的新聞慣例。而由於在守門層次上，「組織」大於「慣例」，亦即上層政策可能推翻下層慣例 (Shoemaker & Reese, 1996)，故更多時候，新聞組織對即時新聞「搶快」、「爭先」的要求壓過「訪問當事人」等查證慣例。進而，本研究指出，日常新聞查證多被視為記者個人的工作與責任，且報社常視新聞重要性、新聞當事人反應及新聞類型（例如是紙本或即時新聞）等，在落實查證慣例上採取寬鬆不一的標準。

雖然日常新聞查證主要有賴記者實踐，但本研究解析新聞組織的路線安排、守門關卡設置、新聞類型的區隔、核稿者是否具備路線領域及情境知識，以及核稿者對新聞查證的提問及要求等，如何影響記者的查證標準及行動。以即時新聞查證為例，不同於過去研究多強調即時新聞對查證的負面影響，

本研究一方面指出即時新聞因負擔大部分日常突發及發展中新聞，加上可接受少量資訊與隨時更新，重視快速及準確地記錄新聞事件表象，故對查證的需求較低；另方面，本研究也強調，新聞組織激化記者面臨的「F3 困境」，且守門機制較紙本新聞寬鬆，使得即時新聞著重「搶快」、「爭先」，對新聞錯誤、不正確資訊的「瑕疵」有較高容忍度。

除了《蘋果日報》，接受本研究訪談的其他三報記者偏向認為報社對紙本新聞的查證要求高於即時新聞，因紙本有較多守門關卡，核稿者也具備路線知識。不過，整體言之，四大報即時新聞負擔大部分日常新聞，紙本新聞聚焦重大日常新聞、深度或專題報導，對查證有較高需求，組織也投入較多人力進行跨線協力查證。亦即，雖然四大報無法如 Macnamara (2010) 建議，停止嘗試即時新聞，但紙本新聞也的確如 Macnamara 所言，朝著著重分析與深度研究的特寫、專題新聞發展，為紙本新聞增值。

最後，本研究指出，四大報在既有的組織分工及產製流程之下，依然可以發揮組織在查證上的團體優勢，提升新聞品質。例如核稿主管除了守門把關，亦可提供記者查證方向、人脈資源、協助查證，以及協調跨線查證。而組織跨線協力查證能讓新聞快速獲得不同路線消息來源之回應、打探消息、交叉確認、分頭查證持續式新聞，甚至發現更多證據，改變原有新聞設計。

（二）建議與限制

本研究指出，新聞查證實踐深受新聞組織設計、文化及慣例等影響。查證可為新聞組織增值，故查證（慣例）既是記者之責，也是新聞組織之責。而從組織層次思考及設計新聞查證規範，不但具體，也更有效。因此，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四點實務建議：

第一，查證慣例多起於新聞個案經驗，故新聞組織可有系統地蒐集新聞個案，建立新聞組織可接受的查證規範與程序。第二，新聞組織可檢視新聞核稿的人數、擁有的領域和情境知識、提問能力，以及跨線協調合力查證的機制等，因前述因素深切影響新聞品質。第三，Bruno (2011, p. 69) 強調，新聞媒體不但要對社群媒體採取開放心態，更要更新蒐集真實資訊的標準與技術。因此，雖然新聞組織可另設專人產製即時新聞，藉此讓第一線記者專心經營路線，但所有新聞工作者皆應具備查證線上消息來源與資訊內容之能力。新聞組織可借鏡如 BBC 網路素材中心，研發網路資訊之查證程序及方

法，同時思考記者定位及分工。第四，目前即時新聞偏向日常新聞報導，強調輕、快、短小，而紙本新聞則因版面空間的物質性，逐漸走向深度及專題報導，強調新聞之間的關係及脈絡。雖然就新聞成品言之，前述趨向似乎很明顯，但本研究發現，記者定位卻因要產製多樣的新聞類型及日漸增多的工作量而日趨模糊，進而影響查證實踐。此外，雖然《蘋果日報》透過不同於另外三報的人力配置與流程設計，讓記者專注於產製即時新聞，但讀者是否能接受「查證」與「刊登」並行的作法，抑或是否所有新聞型態都適合如此，或許需要進一步討論。

尤其網路新聞讓「查證」與「刊登」得以並行，截然不同於先查證、後刊登的傳統作法。事實上，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美國 The Poynter Institute 已提倡以「透明」取代「獨立」，成為新的新聞倫理原則 (McBride & Rosenstiel, 2014a)。國外學者、新聞工作者也力倡增加新聞透明度，包含說明消息來源及其可信度、揭露查證方法與過程、明白交代記者的所知與未知等，藉此提高新聞可信度 (Anderson et al., 2015; Currie, 2015; Grosser et al., 2016; Irby, 2014; Kovach & Rosenstiel, 2010; Little, 2012; McBride & Rosenstiel, 2014b; Phillips, 2010; Robinson, 2006)。進而，根據 Grosser et al. (2016)，網路新聞的「透明」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一是在新聞報導中指明消息來源，以及消息來源在新聞中的利害關係；二是新聞工作者說明、解釋，甚至正當化自己的編輯決策，包含主題與資訊的選擇、安排及評估，另也包括如何處理錯誤報導。亦即，「透明」並非只是揭露 (disclosure)，McBride & Rosenstiel (2014b, p. 90) 強調，新聞工作者需要解釋，甚至辯護自己的決定，因此他／她們必須在行動前就思考該如何說明。具體而言，Hermida (2015) 認為，記者要更開放、透明地讓公眾知道記者「所知」與「不知」，同時在透明化過程中，能夠很快承認並指出錯誤。他強調，新聞真相是歷時浮現，我們對事件所知也是如此。如此一來，以往被劃分成一前一後的「查證」與「刊登」，或許就會如 Brandtzaeg et al. (2016, p. 336) 所言，成為一個相互關連的過程。亦即查證不一定只發生在刊登之前，記者也能在新聞刊登後繼續查證。

最後，在研究限制上，本研究雖已盡力邀訪，但最終訪談成功之四大報記者與主管人數並不平均，使得本研究發現可能偏重受訪者較多的報社。此外，限於篇幅，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討下列問題，故承接前述實務建議，提出未來研究方向如下：第一，記者工作量及定位、呈現形式（如專題、新聞動

畫等)及組織科技採用(如 line 群組)對查證實踐的影響。第二,網路讓新聞「查證」與「刊登」得以並行,同時提供不同以往的更正和更新機制,這些科技潛能如何影響新聞查證,以及是否形塑新的查證標準與論述技術。舉例來說,即使「透明」如前所述,可以是未來網路新聞努力的方向,但在論述呈現上,若在新聞報導中詳細闡述查證方法,又自我評估各種選擇,會不會讓讀者覺得無聊,甚至可能降低新聞的說服力與權威性(Broersma, 2010, p. 28)?抑或新聞可以提供超連結,讓閱聽人直接接觸原始文件,或做為新聞的註釋(Kovach & Rosenstiel, 2010, p. 118)?抑或在不斷更新的訊息上,增加警示說明(Hermida, 2015)?要發展何種新的數位更正方式(Currie, 2015)?這些關係到新聞論述技術的問題,也是未來可發展的研究方向。

參考書目

- 王毓莉 (2016)。〈臺灣四大報即時新聞發展對於新聞專業影響之研究〉，《國際新聞界》，38 (12)：76-94。
- 江靜之 (2016 年 6 月)。〈記者求真路：論新聞查證〉，論文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2016 年會騷動 20 創新啟航」，嘉義。
- 李嘉紘 (2013)。《原生網路新聞網站新聞產製研究》。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論文。
- 林翠絹 (2018)。〈數位優先新聞室：《海峽時報》網絡新聞匯流與轉型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43：73-102。
- 姜雪影譯 (1994)。《製作新聞》。遠流。(原書 Roshco, B. [1975]. *Newsmak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 陳百齡 (2004)。〈新聞工作如何蒐集資料？專家知識的初探〉，《圖書與資訊學刊》，51：35-48。
- 陳萬達 (2008)。《新聞採訪與編輯：理論與實務》。威士曼文化。
- 彭慧明 (2016)。《速度對新聞專業的衝擊：即時新聞現象的討論》。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論文。
- 趙敏雅 (2019)。《電視記者查證災難新聞之社群媒體依賴研究》。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 劉昌德 (2020)。〈小編新聞學：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如何轉化新聞專業〉，《新聞學研究》，142：1-58。
- 劉蕙苓 (2014)。〈匯流下的變貌：網路素材使用對電視新聞常規的影響〉，《新聞學研究》，121：41-87。
- (2018)。〈臺灣記者的 3L 人生：數位時代的工作狀況與趕工儀式〉，《傳播與社會學刊》，43：39-71。
- 劉慧雯 (2013)。〈科技生活現身：「網友」在新聞產製中的角色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末報告，NSC 100-2410-H-004-217-）。取自 <https://9lib.co/document/nzw1d57q-%E7%A7%91%E6%8A%80%E7%94%9F%E6%B4%BB%E7%8F%BE%E8%BA%AB%E7%B6%B2%E5%8F%8B%E5%9C%A8%E6%96%B0%E8%81%9E%E7%94%A2%E8%A3%BD%E4%B8%AD%E7%9A%84%E8%A7%92%E8%89%B2%E5%88%86%E6%9E%90.html>

- 蕭伊貽、陳百齡（2013 年 7 月）。〈Youtube 全民新聞台—爭議性影音素材之使用與查證〉，論文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2013 年年會」，新北市。聯合報編輯部（n. d.）。《聯合報編採手冊》。
- 蘇木春（2017）。《報紙增加網路即時新聞點擊數支專業實踐分析》。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Anderson, C. W., Bell, E., & Shirky, C. (2015). 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Adapting to the present. *Geopolitics,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2), 32-123.
- Barnoy, A., & Reich, Z. (2019). The when, why, how and so-what of verific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20(16), 2312-2330.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X.2019.1593881>
- Boczkowski, P. J. (2010). *News at work: Imitation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abunda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andtzaeg, P. B., Lüders, M., Spangenberg, J., Rath-Wiggins, L., & Følstad, A. (2016). Emerging journalistic verification practices concerning social media. *Journalism Practice*, 10(3), 323-342.
- Broersma, M. (2010). The unbearable limitations of journalism: On press critique and journalism's claim to tru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2(1), 21-33.
- Bruno, N. (2011). Tweet first, verify later? How real-time information is changing the coverage of worldwide crisis events.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publication/tweet-first-verify-later>
- Coronel, S., Coll, S., & Kravitz, D. (2015). Rolling Stone's investigation: 'A failure that was avoidabl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jr.org/investigation/rolling_stone_investigation.php
- Currie, T. (2015). Handling mistakes: Corrections and unpublishing. In L. Zion & D. Craig (Eds.), *Ethics for digital journalists: Emerging best practices* (pp. 130-144). Routledge.
- Diekerhof, E., & Bakker, P. (2012). To check or not to check: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source checking by Dutch journalists. *Journal of Applied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1(2), 241-253.

- Donsbach, W. (2004). Psychology of news decisions: Factors behind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behavior. *Journalism*, 5(2), 131-157.
- Ericson, R. V. (1998). How journalists visualize fac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0, 83-95.
- Ettema, J., & Glasser, T. (1985). On the epistemology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S. Adam (Ed.), *Journalism: The democratic craft* (pp. 126-1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nton, N., & Witschge, T. (2011). 'Comment is free, facts are sacred': Journalistic ethics in a changing mediascape. In G. Meikle & G. Redden (Eds.), *News online: Transformations and continuities* (pp. 148-163). Palgrave Macmillan.
- Gowing, N. (2009). *'Skyful of lie' and black swans: The new tyranny of shifting information power in crises*.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Grosser, K. M., Hase, V., & Blöbaum, B. (2016). Trust in online journalism. In B. Blöbaum (Ed.),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 a digitized world: Models and concepts of trust research* (pp. 53-7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Hermida, A. (2015). Filtering fact from fiction: A verification framework of social media. In L. Zion & D. Craig (Eds.), *Ethics for digital journalists: Emerging best practices* (pp. 59-73). Routledge.
- Irby, K. (2014). Seeing is not believing: Photojourn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In K. McBride & T. Rosenstiel (Eds.), *The new ethics of journalism: Principl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79-88). SAGE.
- Kovach, B., & Rosenstiel, T. (2001).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Three Rivers Press.
- _____. (2010). *Blur: How to know what's tru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Bloomsbury.
- Lasorsa, D. L., & Dai, J. (2007). Newsroom's normal accid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10 cases of journalistic decep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1(2), 159-174.
- Lecheler, S., & Kruikemeier, S. (2015). Re-evaluating journalistic routines in a digital age: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use of online sources. *New Media & Society*, 18(1), 156-171.
- Little, M. (2012). Finding the wisdom in the crowd. *Nieman Reports*, 66(2), 14-17.
- Machill, M., & Beiler, M. (2009).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for journalistic

- research: A multi-method study of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journalists working for daily newspapers, radio, television and online. *Journalism Studies*, 10(2), 178-203.
- Macnamara, J. (2010). *The 21st century media (r)evolution: Emergent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Peter Lang.
- McBride, K., & Rosenstiel, T. (2014a). Introduction: New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 new era of journalism. In K. McBride & T. Rosenstiel (Eds.), *The new ethics of journalism: Principl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1-6). SAGE.
- _____. (2014b). Learning the transparency habit. In K. McBride & T. Rosenstiel (Eds.), *The new ethics of journalism: Principl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89-92). SAGE.
- Manning, P. (2001). *News and news sourc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AGE.
- Phillips, A. (2010). Old sources: New bottles. In N. Fenton (Ed.),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pp. 87-101). SAGE.
- Rauchfleisch, A., Artho, X., Metag, J., Post, S., & Schäfer, M. S. (2017). How journalists verify user-generated content during terrorist crises. Analyzing Twitter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Brussels attacks. *Social Media + Society*.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7717888>
- Reich, Z., & Godler, Y. (2014). A time of uncertainty: The effects of reporters' time schedule on their work. *Journalism Studies*, 15(5), 607-618.
- Robinson, S. (2006). The mission of the j-blog: Recaptur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online. *Journalism*, 7(1), 65-83.
- Rubin, V. L., Conroy, N. J., & Chen, Y. (2015, January). *Toward news verification: deception detection methods for news discourse*. Paper present in the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Symposium on Screening Technologies, Deception Detection and Credibility Assessment Symposium. Grand Hyatt, Kauai.
- Ruth, C. (2016). Cur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orify as a participatory reporting tool in a journalism school newsroom.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22(1), 214-230.
- Schmitz Weiss, A. (200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sroom: The collaborative dynamics of journalists' work*.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 Shapiro, I., Brin, C., Bédard-Brûlé, I., & Mychajlowycz, K. (2013). Verification as a strategic ritual: How journalists retrospectively describe processes for ensuring accuracy. *Journalism Practice*, 7(6), 657-673.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Longman.
- Shoemaker, P. J., & Vos, T. P. (2009). *Gatekeeping theory*. Routledge.
- Silverman, C., & Tsubaki, R. (2014). When emergency news breaks. In C. Silverman (Ed.), *Verification Handbook: An ultimate guideline on digital age sourcing for emergency coverage* (pp. 7-12).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 Thurman, N. (2015). Real-time online reporting: Best practices for Live Blogging. In L. Zion & D. Craig (Eds.), *Ethics for digital journalists: Emerging best practices* (pp. 103-114). Routledge.
-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4), 660-679.
- _____.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 _____.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Free press.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Constable.
- Tylor, J. (2015). An examination of how student journalists seek information and evaluate online sources during the news gathering process. *New media & Society*, 17(8), 1277-1298.
- Wintterlin, F., & Blöbaum, B. (2016). Examining journalist's trust in sources: An analytical model capturing a key problem in journalism. In B. Blöbaum (Ed.),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 a digitized world: Models and concepts of trust research* (pp. 75-90).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本文引用格式

江靜之 (2022) 。〈從新聞組織看日常新聞查證：以臺灣四大報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 (1)：113-152。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11201005

- Chiang, C. C. (2022). Daily news verification as organizational work: A study of Taiwan's four major newspaper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113-152.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11201005> [Text in Chinese]

Daily News Verification as Organizational Work: A Study of Taiwan's Four Major Newspapers

CHIANG, Chin-Chih*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0 journalists, who work for Taiwan's four major newspapers, to analyze the practice of daily news verification at an organizational level. The study found that news verification norms as a routine emerge during the new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in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s. Except for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news stori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news verification is always regarded as the job of individual journalists rather than that of the organization. Further, the news organization's policy requirements of news verification depend upon the number of gatekeepers, sub-editors' domain and contextual knowledg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editors and journalists. Based on the above, the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higher standards of news verification for print news than for online real-time news. Certain flaws in online real-time news stories, which can be short and continuously updated, are often tolerable since they have to be fast and be the first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Finally, the study emphasizes that news verification can be more efficiently accomplished by coordinating journalists of different specialties, interviewing each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collaboratively cross-checking information for corroboration when covering the continuing news. This process may even uncover more evidence that may change the original news coverage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news quality.

Keywords: daily news, collaborative verification, news verification, news organization, routine

* E-mail: morecc@nccu.edu.tw

Received: 2020.11.20; Accepted: 2021.05.28